

江苏省教育厅 2006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从青金石之路 到丝绸之路

——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

沈爱凤 著 | 上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 2006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从青金石之路 到丝绸之路

——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

沈爱凤 著 | 上册



山东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  
艺术溯源 / 沈爱凤著.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330-2656-1

I. 从… II. 沈… III. ①世界史: 古代史: 文化史②艺术  
史—世界—古代 IV. K12 J1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2101 号

策 划: 刘传喜

责任编辑: 韩 芳 翟宁宁

装帧设计: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 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顺河商业街 1 号楼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总印张 4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96.00 元 (上、下册)

## 项目说明

本书为江苏省教育厅 2006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最终成果

项目名称：西亚、中亚和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

项目批准号：06SJB760001。

## 关于本书书名的话（代自序）

这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部专著，耗时八年。

本书奉献给那些敬畏大自然、热爱和平和传统文化、怀有爱心的朋友们。

虽然，实际上我们在本书中所要进行的精神旅行稍稍超出了本书所圈定的范围，但我以“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作为书名，是为了选择两个富有诗意和代表性的事物，作为各民族文化交往史上两个时间端点和空间范围的象征。青金石之路象征了丝绸之路产生以前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丝绸之路的象征意义更是无须我来解释。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很确切的学术标题，则会显得过于庄严和冷峻，容易使读者朋友们感觉疏远。

早在丝绸之路产生以前很久，大西域各民族之间就有了广泛的交往。数千年之前，在苏美尔文明时代，就有一条漫长的青金石贸易之路，连贯着从帕米尔高原到东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区域。当时，苏美尔人的黄金匕首、金碗和雕刻上，镶嵌着产自北阿富汗的青金石（也称天青石）。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青金石是重要的艺术资源，作为宝石和古代壁画蓝色颜料的原材料被广泛使用。现在“丝绸之路”的美名已远远超过了其他说法，使人们忘记了“青金石之路”。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从东方的太平洋沿岸，经过中亚的茫茫沙漠、戈壁、草原和巍峨的雪山，到遥远的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各个文明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了。大西域各民族都惊叹这种闪现着微妙光泽、富于弹性且具有美妙褶皱的神奇织料，伴随着丝绸贸易，各国之间的文化、宗教和艺术得到了广泛的交流。

不只是青金石和丝绸，还有许许多多美好的物品，各种大型石料、黄金制品、黑曜石、孔雀石、玉石、玉髓、绿松石、珍珠、青铜器、玻璃、象牙、水晶、玛瑙、陶器，各种矿藏、木材、地毯、毛毡制品、布匹、毛皮、马匹、兵器、家畜、鸵鸟、没药、乳香、茶叶、橄榄油、无花果以及各种瓜果、药物等等，都参与了各民族文化和经济的交往。

但是，文化交流并不仅仅限于上述物质层面的范畴，更为伟大、崇高的是古代人民的精神创造，那些伟大的宗教、神话和史诗，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伟大建

筑和艺术，所有这些，构成了文化交流和影响的精神内涵，这也正是本书讨论的主题。

因此，本书的书名虽然是以诗意的形式界定所要探讨的大致时间段和地理范围，而实际讨论的内容却是极其丰富多彩的。

本书不仅是关于文化历史和艺术的溯源，实质上还包含了“源”和“流”。我们易于知道历史后期的事物，却难以探悉其源头，所以，我觉得溯源理应包含“源”和“流”，而“源”字本身更强调了文化的原创性价值。因此，在书名副题中我只使用“溯源”，而不使用“源”和“流”。

另外，本书讨论的范围主要是以传统的大西域为核心的，但我并没有在副题里使用这个富于古意的词来表示空间，也没有使用我本来打算使用的、富于整体感和庄严感的“亚细亚”一词，而宁可采用冗长的“西亚、中亚和亚欧大草原”来作为限定。其原因，一是西域是一个古代地理概念，本身就很模糊。实际上现代学者讨论古代问题，往往越过这个地理范围，这个问题本身就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徒增烦恼。人们扩大范围讨论这个问题，本意是为了更清楚、更全面地进行研究，如果引起争议就事与愿违了。二是古代文化的交流本身就大大超过传统“西域”的地理范围。比如，腓尼基人的故土在今黎巴嫩、叙利亚，但他们的足迹遍及地中海沿岸。再如印欧语言民族在上古时代的大迁徙，产生了米底亚—古波斯文明和印度英雄时代的吠陀文化。但印欧语系的语言源头却是涉及整个亚欧大陆范围的，这个问题至今充满争议。三是最初我想采用“亚细亚”来作为象征，同时也表示我主要是讨论亚洲问题。然而中国文明本身虽是亚洲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也受到西域的很大影响，但中国文明本身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的整体，如果以“亚细亚”为标题，而不讨论中国文化，就可能会引起误解。四是即使在中世纪后期，文化交流的范围也是超出传统的“西域”范围的，例如，蒙古人统治的金帐汗国，范围就包括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所以，综合考虑，我宁可采用一个冗长的表示法，以牺牲整体概括来换取一目了然。

我们追溯古代亚洲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实质即是青金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精神之旅。青金石和丝绸本身就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而实际上，古代文明和艺术中令人感动和令人神往的事物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果艺术史不具有诗性的光辉，人们就不会投入巨大的热情。让我们一起追随先人的足迹，去探索各民族的精神世界，领略亚细亚艺术这部壮丽史诗每一篇章的深远意境。我愿与朋友们分享精神的愉悦。

我深知，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人们已无暇回顾远去的历史。但我坚信，在诗意陨落的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憧憬远方的大地，守望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就让我们彼此勉励吧！

沈爱凤

2007年10月于苏州相门

# 引言

在引言中，我想就本书的缘起、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作一个概述，并对本书的某些细节略加说明。

本书是一部关于亚细亚古代历史文化、宗教和艺术的论著，具体来说着重于对西亚和中亚古代艺术的研究。本书涉及到的地理空间，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大西域范围，也包括受到西亚文化影响的爱琴—希腊文化区和地中海沿岸，以及亚欧大草原的欧洲部分，即黑海北部沿岸和北高加索地区。论述的时间跨度，从原始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开始，截至中古时代伊斯兰教兴起以前，各地区上古文明的终结并没有统一的下限。

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后，亚洲历史文明的整体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亚洲艺术的原创因素主要是在上古时期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古时期堪称亚洲古代艺术的黄金时代。我对伊斯兰教认识有限，因此本书讨论的范围只限于上古时代到中古早期。

本书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为依据，试图通过整体的观察方法和文化比较，认识和评价亚细亚古代文化和艺术的重要价值。本书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各文明的重要艺术样式和造型的比较研究，同时也对各相关神话、宗教和民族问题进行讨论。

具体说来，本书的任务或目的：一是对各语言民族的历史、文明及其相互影响进行宏观理解；二是对古代宗教和古代神话的继承关系加以阐述和分析；三是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对各民族艺术的起源和相互关系加以探讨，并对造型问题、个别专题和作品进行深入地研究，试图从文明的高度认识艺术史，从各个文明的文化本质角度理解和阐释艺术史，并从造型的角度来论证和解释各民族在艺术方面的相互交流。

—

长期以来，有关西方文化和艺术的书籍很多，相比之下，研究亚洲文化和艺

术的书籍却很少。许多人并不了解亚洲文明，甚至对我们自身的传统也不甚清楚。人们对不少西方文化名人和艺术家耳熟能详，对本民族文化艺术史上的杰出人物却知之甚少。

我多年在高校从事艺术史教学工作，常常为亚洲文明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而感慨。多数美术史著作和教材偏重西方，众多外国美术史教材几乎都被写成了西方美术史（准确地说写成了欧洲美术史）。许多与外国美术史相关的教材，皆以极大的篇幅谈论西方艺术，而把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波斯和美洲放在极次要的部分或书尾附带地介绍，至于中亚、非洲和亚欧草原等几乎很少提及。据我所知，范梦撰写的两卷本《世界美术通史》大概是例外，虽然这是一部简史，但对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却给予了较公正的评价。我一直把它定为自己课程的教材。

相比之下，西方各国、俄罗斯（包括苏联）和日本等国的学术界，却十分重视对亚洲古代文化的研究。

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集美博物馆、柏林国立博物馆、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柏林近东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博物馆、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美国华盛顿弗列尔美术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等等，藏有大量来自亚洲的文物和古代文献，其中还有大量来自中国西部的发掘品。西方学术界有着众多知名的考古学家和东方学家，如谢里曼、伊文思、博塔、罗林生、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约翰·马歇尔、雷奈·格鲁塞等都大名鼎鼎。我还听说美国前几年出版了苏美尔大辞典和萨珊波斯四卷本精美画册，但我没能得到这些资料。

印度新德里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日本冈山市立博物馆、韩国国立博物馆等，藏有来自西亚、中亚和我国的精美壁画、雕刻、古代文献和其他工艺品。

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和乌克兰基辅历史博物馆，还有西亚、中亚和原属于苏联的中亚五国博物馆，如德黑兰国立博物馆、巴格达伊拉克国立博物馆、阿富汗喀布尔博物馆、叙利亚阿勒颇博物馆、土耳其安卡拉博物馆、乌兹别克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塔吉克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等，也藏有大量亚洲和亚欧草原古代文物。

除了上述世界著名博物馆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博物馆，包括许多大学、公司和私人博物馆，也珍藏有诸多亚洲和我国古代文物。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刊布了大量考古新资料，出版了众多相关的新画册。俄罗斯和苏联加盟国有许多东方学专家，如谢尔盖·托卡列夫、米哈伊尔·马松、加利娜·普加琴科娃、鲍里斯·斯塔维斯基、鲍里斯·马尔沙克、维克多·沙里阿尼迪、拉扎尔·列姆佩等等。

日本也特别关注西亚史和敦煌学，多年来，他们对有关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所编撰的世界美术画册包含大量西域的内容。1980年前后，他们组织考察队对整个丝绸之路所经各国进行连续几年的实地考察拍摄，其剪辑而成的10张光碟影片《丝绸之路》广为发行。

打开英、德、日、俄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博物馆、大学和专业机构学术网站，



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介绍大西域各文明的图片、专著和论文等，许多资料都很详细精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大英博物馆网站提供了代表性藏品的图片和说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网站图文并茂、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各文明的历史和艺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rubens网站提供了几乎全世界各大博物馆馆藏作品的详细图片，日本“「東洋文庫所蔵」画像史料マルチメディアデータベース”网站将英语和德语版本的数十种考古学原著拍摄成影像版本，并提供彩色和黑白两套图片以及相关地图。

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有关大西域和草原方面的论著、文章绝大部分都没有被翻译过来，包括一些古代经典著作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我国学术界在大西域和我国西北、北方地区古代文化研究方面仍然获得很大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发表了有关西亚上古文化、波斯文化、希腊和希腊化文化、中亚文化、亚欧草原文化和新疆—青海—内蒙古—甘肃古代艺术等论题的各种论著和文章。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也翻译出版了许多国外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的著作，并编撰出版了诸多艺术作品集。如1997年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齐《俄藏敦煌艺术品》四卷本。2006年春，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了由林梅村担任学术顾问的电视片《新丝绸之路》。2006年12月，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节目连续播放了多集电视片《消失的绿洲古国》等。

正是通过阅读中外思想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大量著作，我才得以逐步了解亚欧诸多古代文明，本书多处借鉴、引用了上述学者的观点和他們所提供的资料。

但是，伟大的亚洲古代文明和艺术，不应当仅仅只被考古学所关注，也应为艺术史所关注。比如，敦煌学和中亚美术的研究现在只是少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情。虽然对敦煌的宣传不少，但实际上即便在很多大学，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传播。若干年以来，我在教学中尝试增加了一些西域艺术的内容，受到学生们的喜爱。我发现，并不是普通人不能理解这些古老文明，也并非人们缺乏兴趣，而是传播和重视的力度不够。所以，我一直期望从艺术史的角度，写一本学术性和可读性兼顾的亚洲艺术史专著。本书实现了这一夙愿。

本书的写作开始于1998年冬季，但由于中文版相关书籍和图片资料匮乏，加之写作初期与外部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交流，进展非常缓慢。2003至2004年，我获得留学俄罗斯的机会。在俄国各地博物馆，特别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我得以观摩大量古代实物，尤其是黑海、南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阿尔泰山—萨彦岭的草原文化。同时，我在俄罗斯各地尽可能地收集相关资料，并游历了俄罗斯西北部、伏尔加河中下游、西伯利亚等地，这对写作有巨大的帮助。期间，我偶然接触到19世纪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的哲学著作，这使我有机会从宗教和民族学的角度，对各民族发展自身文化的问题进行思索。

由于我长期从事绘画和艺术史教学工作，从1984年至今，写了许多关于西方艺术的文章，期间还写了一本反思现代艺术的书，但由于互相冲突的观念太多而被迫搁置，未能完成。这样一来，我的第一本书却是有关亚洲艺术的，这实际

是个人文化取向发生变化的结果。

早在1985年夏，我就专程前往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探访古迹，被古代文化深深打动。之后，我又陆陆续续在山西、内蒙古、陕北、东北、山东等地探访。在本书即将完成时，我再度前往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对众多古代佛教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如果说当年我对西域的神秘具有幼稚的冲动和向往，那么，今天这些激情则化为了潜心探索的动力。

写作本书的起因除了学术以外，直接的原因主要来自国际政治。

1991年美国 and 伊拉克之间爆发的波斯湾战争，另外十多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世界性的政治动荡和局部战争，使我对西方文明有了新的认识。那时，我读到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和比利时物理学家伊里亚·普列戈津的一些著作。阿诺德·汤因比关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角与和平主义的忧患意识，给人以新的观念，使人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保持清醒。伊里亚·普列戈津的耗散结构的自组织理论，即关于宇宙和自然世界的混沌学体系，给出了一种对世界的复杂性予以全新考察的新思路。

实际上，这种混沌学思想，在老子《道德经》以及《庄子》的《齐物论》、《养生主》、《大宗师》、《应帝王》、《天运》、《知北游》等篇章中，已经得到了阐释。他们把整个宇宙、世界看成一个具有生命的、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存在，一种大道，万物各有所为，却互为依存，彼此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人们如果破坏了这种整体和谐，就会产生混乱的后果。

庄子在《应帝王》末尾写了关于中央之帝浑沌的奇怪故事，说浑沌无七窍，受浑沌恩惠的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浑沌，给他凿出七窍，结果浑沌却死了。庄子通过这个故事，实际上揭示了东方的一种至高认识，按照阿诺德·汤因比在他与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二十一世纪》里的评价，意思就是“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汤因比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sup>①</sup>

英国大学者李约瑟把老子和庄子的“处无为之事”、“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解释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sup>②</sup>物理学家弗里特约夫·卡普拉评价说：“在伟大的宗教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是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以及两者潜在的基本一致。”<sup>③</sup>陈鼓应先生把它解释为“顺任自然”和“不妄自造作”<sup>④</sup>。当代科学的混沌学和一些绿色和平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对这些古老思想的继承和发

①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樾译，287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②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转引自余正荣《生态智慧论》，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③ 转引自余正荣《生态智慧论》，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④ 陈鼓应注《庄子今注今释》，565页，中华书局，1983年4月版。

展，从而使这些古老思想的意义，得到了具体精微的科学描述。

尽管我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深奥的道理和宇宙的奥妙，但通过阅读，我的眼前却渐渐展现出世界历史的广阔景象，以及大自然无限复杂、神秘的多元化景观。他们的卓越见解，触动了我的灵魂，感到有必要重新研究古代文明，以期更全面地认识人类的文化和艺术创造。我想，整个亚欧文明史也像道家所说的那样，就是一个连贯的生命的整体。各个文明的兴衰存亡，都是大道的不同表现形式，顺应着天时、地利与人和各种因素的种种变数。它们各有其独到之处，也相互影响，互为借鉴和补充。我们只有以这种生态的世界观去感悟历史，才能领略伟大文明史的整体性和多元性的复杂变化，才能领略古代艺术之蕴涵，才能领略文化所体现的人类精神。我国先秦的老庄学说、西方的文化历史类型学说、混沌学理论、佛教和儒家学说等，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们具有相互共通的精神。

今天，在日益显示出全球化的世界里，现代交通系统和信息技术使得联系性和整体互动性占了绝对显著的位置，与之相比较，似乎古代各文明都是孤立存在的。而事实并非如此，除了远离旧大陆的美洲文明在孤立中缓慢发展了千百年，上古亚欧大陆的各文明群体之间，通过草原、沙漠、海洋等，仍然保持着顽强的联系，其整体性并不亚于今天。所以，并不是由于西方列强开拓了世界的市场，历史才变得成为“世界历史”。早在圣奥古斯丁（罗马帝国北非的希波城大主教）谈论“上帝城邦取代世俗城邦是世界历史之目的”以前几千年、早在歌德谈论“世界文学”以前几千年、早在卡尔·马克思谈论“世界历史”以前几千年……生动而丰富的“世界历史”已经出现在亚欧大陆各民族的大迁徙浪潮之中。

另外，对于古代文明来说，孤立性并非是一件坏事，那些独特的区域文化特点，如果离开了孤立性也就无从谈起，孤立性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征。在我看来，历史上地区性的文化特点所带来的生动的多样性，正是世界历史的精彩篇章。

长期以来，在外国古代美术研究方面，人们往往过于关注希腊古典文明，相对忽视亚洲文明。实际上，亚洲上古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和亚欧大陆草原文明，构成了亚欧大陆古代史的核心主体。虽然西方学者承认，西亚和埃及文明是希腊文明的母体文明，但在具体的重视程度和评价上，却明显过高看待希腊罗马文明。迄至今日，西方中心论仍然流行，并对我国各相关学科有很大影响。黑格尔关于希腊宗教为“美的宗教”之观念，也仍旧左右着我国美术界对希腊艺术的看法。我们之所以熟悉希腊，并以理想化的向往之情缅怀它们，甚至将之奉若神明，主要是文艺复兴和西方近代文化造成的价值观，或者说是西方文化扩张的结果。在先入为主的观念中，充斥着温克尔曼、莱辛、黑格尔、别林斯基、罗丹等无数大师对古希腊的赞美，似乎唯希腊才是诸古文明中至尊无上者。

遗憾的是，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民族性，但在过去若干年中，却忽视甚至毁坏了许多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我们也从未认真关注过西方文化以外的其他外国文化，而是过于关注眼前的实际利益。在历史上，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即使在中国历史的低潮期，也都是在保有我国文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吸纳和融合外来因素。从不曾像现在有些人，在否定传统并有可能丧失传统的前提下进

行现代化建设。

我赞同多元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民族观和文化观，离开这些朴素的真理，便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或大汉族主义的文化泥潭。我想，研究古代文化不可能纯粹是为了欣赏，以满足怀古之幽情，主要还是为了了解人类精神的奥秘和文化多样化的意义，就像自然科学家了解地球和生物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一样。倘若古代学问一点儿也不能引发对真理的认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那么，这项研究就不会富有生气。

我所说的多元主义并不是指政治家说的多元政治格局。按照由殖民主义传统沿袭而来的现代竞争原则，国际舞台的多元格局是指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多元并存、互为平衡，而他们各自所信奉的却很可能是相同的现代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这里的多元化是指不同区域、不同价值和不同信仰的各文化形态的共存，类似于大自然生物系统的多元化，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文化多元化。

当然，对于多元主义前景，我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一些著名学者怀有一种乐观的瞻望，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而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却非常了解，将来还会把中国的东西推向西方，用东方的和平主义思想改良西方文明的弊端。我非常赞同他们的主张，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种天方夜谭般的幻想。我所看到的是，我们正在以牺牲汉语的地位为代价来推广英语，许多高学位的年轻人正在忘记民族传统。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不少人都在努力地西方化，并以此全力投入所谓全球化竞争的漩涡。

与此同时，在当今世界，自然的景观正逐渐消失，大量野生动植物不可挽回地灭绝或正在灭绝，大片良田和湿地被新一轮的城市扩张所吞噬。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自身所创造的许多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古代建筑和城镇也迅速消失，较好的情况也只是被改造成旅游景点而得以幸免。许多民间艺术、风俗民情和秘传技艺正在消亡，古老的中医也面临巨大的危机，许多古代墓葬被盗掘，大量珍贵文物被盗卖海外，等等。

关于如何看待外语教育政策，我的观点与陈丹青一致。我认为人为地抬高英语地位而造成汉语被贬低的客观后果，对于汉语的继承和发展是极其有害的。我认为，一个人外语水平的高低，并不意味着其文化和专业修养的好坏。文化和语言具有关联性，但不是一个层次的事，理解文化需要更多的东西，包括哲学、历史、宗教、艺术和语言。自古以来，伟大的创造一般基于母语思维的力量，而当前一些高学位的获得者，很多是钻了外语政策的空子。过去 20 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将来还将证明这一点，这种一味偏向外语的教学模式，客观上是为西方式的全球化推波助澜。

我认为，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们拆除了许多古代建筑。这其中，不仅有观念革新的影响，也不仅是为了赶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还有很多人不愿意说出口的原因，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丢掉了民族的灵魂。包括一些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内心深处向往的很可能是一个现代化的舒适环境和体面的现代社会的高级身份，向往着自己种种炫目的、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可悲的是，很多人“真诚地”认为那些老房子没有什么价值，认为那些传统儒家

经典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

所有这些，皆源于传统的丧失，有一句老话说得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如何继承发扬汉语思想传统，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有历史遗产、民族文化和自然特色，是我们应当长期予以关注的问题。

放眼整个世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一系列局部战争中运用了高新技术，刺激了全球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引领了一个计算机技术迅速普及的新时代。自此以后，当代世界忙于一场新的可怕竞争，人们似乎再也顾不上考虑地球的未来，顾不上考虑无数其他动植物的命运，更不用说对古老文明的再思考。

所以我觉得，对于现时代，一个不懂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的人，固然是无法从事较深程度的文化研究的。但在另一方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对大自然、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关注，应该和对经济发展和世界政治风云的关注同样重要。

我们认识历史和古代文化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揭示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各种关联性，把文化纽带上的种种环节摸清楚，另一方面，研究本身具有现实意义，不单是对古代西域政治版图展开研究，而且，在当今急速趋向全球化的世界，认识古代文明所蕴涵的多元化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

什么是西方文明？在我看来，就是指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全面获得胜利之后的西方文明，特别是指在此基础上，由近代科技和军事、经济力量支撑下的近现代西文明。西方文明以近代科学神话般的凯歌行进，许诺给世界美好的无限发展景观，使世界各国在其军事、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冲击下，或被迫或自愿地接受其价值观和生产方式。其结果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接受了西方体系，来代替自身的古代文化，他们各自古老文明的内在精神动力却日益被削弱。换言之，西方体系的一元论模式逐渐取代了全部其他模式。在今日世界各地，大多数的教育模式和学习内容都以西方文化和西方模式为准则。

河清把这种各民族传统文化消失的现象称为“国家意识的衰微”或“国族个性的衰退”，主张恢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他还特地把humanism（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翻译成“唯人主义”<sup>①</sup>，认为这是西方文明的根本特点之一，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他指出：“在世界主义的表象下，进步论实质上乃是一种欧洲文化中心论。”<sup>②</sup>关于进步论，客观说来，从19世纪以来的历史看，进步论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上的真理性，但不能把它教条化。进步论比较适用于描述生产力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态势，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原则，也只是描述了世界运动的某一个方面。它们并不是普遍适用的，特别是以这种进步论来研究和评价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史，将会得出极其荒谬的一元论的价值标准和结论。然而，宇宙和世界历史的运行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用一种模式必然很难描述自然和世界历史的运动奥秘。

<sup>①</sup> 来自黄河清的讲演内容，2006年12月7日下午他在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公教楼举办了题为《全球化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的讲座。

<sup>②</sup> 河清著《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66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多年来，我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研究过法国革命史和西方现代艺术史，也初步了解了西方文明的优势所在。但世界并不只是一种文明，很多地方的问题和事物是欧洲所没有的。由一种文明产生的东西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也不能解决世界的很多难题。

自20世纪初期以来，甚至在西方社会，也产生了许多反对一元论模式的声音。在种种相互矛盾的西方后现代思潮中，有一种鲜明而清新的声音不同于其他思想。这一新的观点以20世纪的现代科学，包括生物学和哲学理论为基础，重新发现了古老东方自然思想（如老子、庄子）的宝贵价值，从而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这些理论质疑一元论模式的长期有效性，赞成有限而多元的发展观，赞成各民族各文明和平共存、协调发展，反对以人的主观意志和人类单一生物物种的利益为中心，无限和无节制地开发、掠夺大自然。

这些新思想给了我们一种重要的、新的启蒙，使得我们能够有依据地反思当下世界，反思作为人类家园的大自然的未来，并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的古老文明。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才决定写一部关于古代亚洲文明和艺术的书。

## 二

再谈谈我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历史上实际有过多少类型的文明兴盛衰亡，恐怕谁也说不清，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一些历史学家将世界历史各文明分成若干种类，这种文明树的观念更强调各个文明的特殊性，是一种认识历史和文明的方法论。而实际上，各文明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

历史学和哲学注重各文明的性质、历史重大事件的影响、典籍和历史记录、人类思想的发展，以及如何识别历史的宏观思考方式。这些方面对于认识人类历史的规律和人类文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些互为冲突的形形色色的思考方式并不能取代历史本身。历史和历史学是不同的。历史是人类历史本身，而历史学乃是对过去事件的记载和评价，是人类精神传承的方式，同时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手段。尽管如此，在历史学的宏观把握中，仍然能够找到关于历史的客观真实。

另外，由于西方当代哲学从形而上学移位到语言学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诸家认为，经典哲学关于本质的探讨，关于“宏大理想”的论述，实质皆为某种“宏大叙述”，而与事物的真实本质相去甚远。因此他们对历史学等所有学科进行冲击，对历史学等学科是否能够真正阐释历史的本质产生怀疑，其结果是将全部历史学的论述视为现代人的某种阐释，从而陷入不可知论。在我看来，历史和古代文明仍然是可以认识的。假定有一种客观的正确性存在，那么，不管个人的理解距离正确性有多大的差距，其客观性终归是存在的。后现代主义某些特别的观点，应该被看作主要是针对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的反思。因此，固然任何人都无法复原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历史学说都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阐释，但是，我们反对以此为理由用主观臆测来取代、歪曲甚或否定历史文化遗产。纵然我们

永远无法接近或触摸历史真相，或者历史真相很难完全对我们敞开，历史仍然存在固有的客观性，即一种永恒的力量。这正是它所构成的一种永恒的魅力。

考古学通过田野考古，取得了无数重大的发现，一方面可以给历史提供实物证据，另一方面可以将历史记录所缺失的部分补上。考古学强调对文物器型的详细分类，有助于我们认识器型的发展，有助于考察器型的传播和器型之间的关系。考古学对现场的忠实记载，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人民真实的生活。在亚欧大草原，由于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资料，那些古墓及其发掘物，就成为了解早期草原文化的唯一资料，分类学关于各遗址的器物类型的比较和分析，就成为揭示它们奥秘的重要手段。但是，分类学并不能代替历史，分类学往往不能单独解释精神因素。同样的器型在不同文明中的作用很可能完全不同，在各民族具有相同作用的一些神祇，在类型上却形形色色。例如双马神或格里芬，它们属于同类型的怪兽造型，但在不同民族中的作用、意义有可能不同。再如分属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母神，由于相互影响和人性的普遍性，有可能形成相近的体系，作用也有可能一样，但造型却不一样。所以，具体的情况比较复杂。但相对于历史学和哲学，考古学如果缺乏历史学宏观的视野，轻视神话传说和记载有误的典籍，这种狭隘的考古学难免会等同于收藏学。伟大的考古更应当注重具有普遍意义的发现，并力图解释遗址的文化历史意义。

我国当代工艺史家们则强调造物的观念，强调形象的观念，强调对艺术造型本身进行研究，对造型的具体特征、造型规则和风格具有深入的形象的描述，但相对缺乏对思想发展史、古代宗教、史诗和古代文献的研究，缺乏对形象所赖以依托的精神因素的关注。换言之，我们不仅要研究造物和造型本身，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们创造它们的动机或目的，也就是要了解古代建筑、古文物和古代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涵。因为古代人创造艺术绝不像现代人那样为了纯粹艺术的目的。人类的发展史是为了人类生活本身，而不是为了艺术。古代社会一切造物或工艺，乃至建筑，都是出于生活或宗教之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史只是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和目的，从人类生活史中单独剥离出来的历史的一些样本的汇编而已。另外，在我国艺术学院的教学中，在美术史论的研究中，尤其缺乏对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关注，对各民族所生活的区域地理特点、地理变迁和意义以及遗址的确切位置，都缺乏必要的关注和研究。我认为，满足于模糊而泛泛的认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来自西方的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引入我国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但在艺术史研究中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由于受到现代设计史研究的影响，我国学术界有一种将工业时代的“设计”（Design）概念与历史上各民族的手工艺加以等同的倾向，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原因很简单——当代设计的单一价值观念、动机、科学背景和结果，与历史上各民族手工艺制品所产生的原因以及其多元的文化属性具有很大的不同。原始社会和农业时代，手工艺依附和从属于自然和人力技术，没有对自然构成很大的威胁。而现代设计是以科学技术、现代能源为基础，将人的需求抬升到了绝对的“唯人独尊”的地步，表层目的是为人服务，而本质目的是获得利润，其结果有可能对大自然产生威胁。许多人回避这一点，我觉得，这是缺乏责任的表现，是不应该

的。而且，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的“设计”概念等同，也是某种西方中心论思想和进步论作怪的结果，是凡事都想与西方的或者说“先进的”科学体系挂上钩。而实际上，几千年来的古代历史，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科学标准体系，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意愿照样发展了他们的文化。而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古代文化，或者硬是把现代标准套到古人头上以评估其优劣，这种念头本身就是荒谬的。

在美术方面，当代艺术家们虽然显得很超脱，实际上却很现实。他们重视感性的造型的意义，特别是他所理解的对其自身具有图像学意义的旨趣。他们关心周围千变万化、日新月异的现实世界，而只是将古代艺术作为偶尔的借鉴，对历史文化和古代艺术本身缺乏兴趣。特别是，由于西方近现代艺术的冲击，我国当代已成名的艺术家们大多已经西化。他们精通油画、西方音乐和设计，对古代文化传统却十分疏远。甚至有一些人刻意诋毁传统文化。例如，当代一些名气巨大、声望显赫的大导演，在其所执导的影片中，往往将传统婚姻、传统道德甚至古代中国描绘得一团漆黑，给年轻人和外国人以极为有害的错误的导向。

正在成长的一代则不仅对古代文化，甚至对西方近现代文化也缺乏关注。他们主要忙碌于新的压力带来的就业竞争，并沉浸于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娱乐。

另外，由于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普及，人们习惯于用所谓的“科学的思维”来看待一切事物。而1900年以来的当代科学，特别是混沌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近代理性主义科学观的局限性，看到了大自然和生物系统的无限复杂性，看到了人类理解力的有限性，因而少数思想家开始走出理性主义误区，试图回归自然本身。同样，在历史学和艺术史领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也是这种“科学的思维”。而我以为，用近现代思想方法、价值观和标准去评判古代文明，这种方法是值得怀疑的。

由此可知，各门学科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应当尽可能地跨越各专业的局限性，从伟大文明的高度看待历史文化。当代艺术史研究存在的最大弊端，是以一元化的规律性的教条来取代具体的多元化的研究手段，如此得出的结论也就可能千人一面。自从我理解这个道理后，我就很少与他人就这些问题展开争论，因为这些争论毫无意义。这些导致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个人没有办法加以解决的，此乃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实际上，古代史诗、经典和文献，包括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同样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不只是古代遗址和考古实物能提供给我们以真实有效的实证证据，曾经存在过的许多伟大建筑和人类的创造物，包括那些艺术杰作和工艺制品都能给我们以启示。尽管它们早已不复存在，曾经发生的许多故事也被遗忘，但是通过传说，它们被曲折地记录下来，我们便不能简单地说它们不属于历史。在现代考古史上，许多伟大的考古发现，正是借助于史诗、神话和宗教研究，甚至借助于幻想，才获得重大突破的。例如本书中常常提到的我国典籍《山海经》，按照现代标准，它是极为模糊的记载，但它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有许多一致的地方，现代考古发现也一再证明这些古代记录绝非虚妄。就我个人而言，甚至是把希罗多德的《历史》作为信史来看待的。因为，从《历史》本身的境界来看，希罗多德绝不会伪造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把他直接看到的和间接听来



的，区别得很清楚。对于他那个时代，他拥有比我们更多的发言权。

当然，史诗、神话和传说不等同于历史。虽然它们具有价值，但在确定历史事实时，我们同时必须尽可能地运用考古学的实证依据，否则我们只能推测和猜测。

所以，我想应当将各个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加以综合，我们才能辨认和推测各文明及其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推测也只是一种方式，没有人可以断定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的判断就一定是对的。所以，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方式都是片面的。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比较史诗、神话之间的影响、传播、融合和演变，通过研究艺术造型之间的相互影响、借鉴和变化，通过研究古典典籍和文献，通过研究宗教的发展、演变和相互影响，通过研究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和相互关系，通过研究各民族语言系统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甚至通过自然科学的某些经验，例如生物学中的食物链概念给我们的启发，等等，才能认识人类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史。换言之，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具体实物认识历史，但我们也可以通过认识古代宗教和古人的精神去认识历史，反过来再认识他们的创造物。这些不同的认识方法和途径都有各自的优点，可以相互弥补。单凭艺术和实物本身说明不了精神。而通过一种文明、一种宗教，却可以解释艺术和具体实物，而没有实物，也不能体现精神的具体呈现方式。两个方面都同样重要。

我没有专门学过图案艺术，只是在研究大西域文化时，逐渐接触到它们，久而久之，有了一些体会，并开始关注图案。但是，对于今天热衷于现代设计的许多人而言，他们醉心于抽象的几何式的造型，古代图案正在失去魅力，因为他们并不了解隐藏在图案中的文化内涵。而实际上，图案甚至是古代手工艺的文化意义的最重要的标志。图案装饰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各民族各宗教都可加以借鉴为己所用，但一些重要纹样仍然与其所属地区的大文化属性有所关联，各地区在借鉴这些图案时也会进行改变以适应宗教或日常所需。因此，在考虑其相对独立的装饰性的同时，仍然应将它们视为大文化的从属或被融合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在广大区域里通行并变化着的图案，印证着人类艺术的通融性和地区特点，印证着千百年来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甚至可以说，这些纹样方面的原创性和变化的意义，在有些时候，例如在文化的创造意义或者相互交流的意义，比一件手工艺的整体造型还要重要。

此外，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古代的文化和艺术？

就我来说，并非为了满足个人的思古幽情，也不仅仅为了各自的专业，或者其他什么实际的物质需求，更不是为了发财或收藏古董，而是传统的精神文化本身。我个人支持国家投资古物收藏，但对民间商业性的私人古董收藏和交易并没有兴趣。我并不反对收藏，古代文明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是由那些考古学家的探险激情和个人收藏激发起来的。严格来说，一切现代国家的收藏，首先源于个人的收藏，我所反对的是把收藏仅仅视为积累财富的手段。那么多人醉心于收藏，与其说是对文化的兴趣，不如说是对金钱和占有古物的热情，这对文化的继承并没有多少帮助。这种心理也影响了博物馆的运作。我国的博物馆很少有对学